

论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李 玉 宏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邓小平的人民主体观深受中国悠久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应取得最大民主权,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围绕人民利益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加以贯彻、落实。这一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早日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5-0005-07

人民主体观是一种基本层次上的哲学范畴。它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的地位和性质。这种自主性表现为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现代社会,它又具体地表现为人的独立思考,积极参与,自我决策以及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精神。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重要位置,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思想。

一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渊源

就理论方面来说,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他的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渊源方面有着深厚的联系,并从中汲取了中国传统人论中的精华。

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大都把“以民为本”作为其治国方略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管仲是较早提出“民本”思想的历史人物,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1](《管子·霸言》)。在论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时,《尚书》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

固邦宁。”孟子在总结尧、舜因得人民拥护而得天下,桀、纣因失民心而失去天下的历史经验时,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道理,并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2](《孟子·离娄上》)。荀子以舟水来比喻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也常以此语警醒自己,注意治国之道,以保国泰民安。在如何安民利民问题上,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1](《管子·治国》)孔子也提出安民利民的主张,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3](《论语·颜渊篇》)而荀子则认为要爱民就要顺民心,“礼以顺人心为本”[4](《荀子·大略篇》);他还提出了平政爱民的思想,说:“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老子对安民利民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应该“以百姓心为心”[5](《老子》第四十九章)。孟子更提出了“利民之产”的经济方案,即给每个农户“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平安富裕的日子。唐代名臣魏征上谏说:国君既“为人父母”,就应“抚爱

收稿日期:2004-03-22

作者简介:李玉宏(1975—),男,安徽省淮北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2003级研究生,指导教师石开贵教授。

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并常常提醒皇帝:“怨不在大,可畏维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虽然这些思想不具有唯物史观的性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实属难能可贵。

邓小平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重民、安民、保民等一系列思想,对终生心系中国百姓,到人民群众中寻找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的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81年,他在为国外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就宣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但他的这一思想绝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简单传承,而是闪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辉。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判了古代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古代的“民为贵”、“民为上”、“民心不可违”等思想,把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良将、包青天之类清官体恤民生、为民请愿等千古传颂的言行,与当今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给予分析、概括、总结,从而提出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以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一生来说,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忠诚地履行其诺言,其深沉浓厚的民本意识,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

二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内容

(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古往今来,利益一直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根本动因。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和庄严的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262页)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264页),“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

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6](284页)。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不同,其阶级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因此,他的最高理想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精辟的论述和见解,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唯一宗旨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奋斗的客观必然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利益的思想,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各项方针政策的标准。他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不断地告诫全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离不开群众利益,是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群众利益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只有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不会被人民抛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257页)。由此,邓小平在解释“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和任务”时说,“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8](163页),并且要求“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8](337页)。而且反复强调,要大力“提倡和表彰”“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8](367页)。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邓小平多次指出,单单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还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8](342页)。而且,“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8](368页)。他进一步要求广大干部、党员,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8](217页),而且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8](358页),“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8](368页),以此来“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8](369页)。

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的思想,使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时代主题。

实践表明,只有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民才喜欢,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顺利发展而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上,我们党在对人民利益的认识和表达上曾有过严重过失。一是错误地认为人民的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人民的利益就得到了保证;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坚持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人民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任何违背这一主张的观点和做法,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从而又为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对人民利益内涵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人民过着共同贫穷的生活,人民利益实现的程度相当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内涵。

但是,党对人民利益内涵的准确表达和认识,仅仅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能必然提供真正使人民利益得以实现的有效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的,不是把实现人民利益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应由人民群众自主地完成,而是由上级领导者大包大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束缚了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割断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与其自身利益的关系,这必然抹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并导致领导干部作风的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沉痛教训,并最终导致人民利益的落空。这样,寻求维护人民利益的正确途径势在必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人民利益的实现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9](116页)。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其目的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82页)。只有改革,人民才信任我们,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改革,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最大的损害。通过改革,人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的利益相应地得到了最大的实现和维护。

纵观邓小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时代主题思想,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是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时,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正确指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法宝

(二)人民应取得最大的民主权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型的和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各方面都具有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大的优越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党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和决策,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针对我国受长期封建意识影响,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淡薄,行使民主权的能力不高的现状,邓小平提出要增强广大人民的民主意识,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真正行使对党进行监督的权利。因为“无论党内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为确保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8](146页)。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丰富而深邃,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主建设的根本指针。

(三)着眼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才能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方向。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上。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的利益所在。在他的经济理论中,邓小平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点,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128页)。“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8](314页)。1992年初,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372页)。

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在衡量改革与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根本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增进,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最高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社会生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才能“保证他们的体力、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440页)。发展生产力,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党曾片面强调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忽视人民物质利益的深刻教训,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提出了物质利益原则。他指出,人人都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的个人利益,要

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多劳多得”。“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146页)。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9](265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出于对人民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邓小平还批判了历史上的平均主义观点,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富裕是“人民共同富裕”[9](265页)。离开人民的共同富裕,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页)的著名论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那样就离开了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

(四)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

1. 人民群众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在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定地捍卫了这一基本观点。他坚定地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9](4页)邓小平对人民主体性的确认和发挥,主要表现为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8](368页)而且,他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热情地肯定和坚决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曾谈到:“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9](382页)他还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文中指出:“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9](252页)在谈到他个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他说:“我个

人做了一点小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9](272页)

所有这些表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而且对诸如“精英治国”、“精英政治”、“英雄创造历史”一类的新英雄史观给予了重重的回击。

邓小平不仅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

(1)邓小平从群众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上说明只有人民群众才具有实践创新和认识创新的能力,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8](45页)这表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他所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认识,都必须由人民群众来创造性地完成这一观点,也是与实事求是密切相关的。邓小平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就以给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后出现的农民实事求是的实践创造,生动地说明,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才最具有成功的把握性,因为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他们对自身实践领域中的实际情况及其内在规律性,了解得最丰富,最全面,最清楚。他指出:“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9](238页)

(2)邓小平将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的新实践;另一种是由人民群众间接创造的新实践,即由群众的意向和要求,启发和引导并推动了领导者的实践创造。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新实践,表面上看是由领导者创造的,但从根源和实质上看是群众的创造。因为没有群众的意向和要求,就不会有这种创造,而且这种创造之所以经过领导者这个中间环节,也是由社会组织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因为这类实践必须由领导者来发动和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它

也会由群众直接创造出来。

邓小平关于实践创造的两种方式的思想,科学地说明了一切新实践归根到底都是群众创造的。这就是说,我们以前的实践创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源泉。邓小平在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对这一点作了明确说明。他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9](91页)

2. 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通过改革得以充分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物质层面上看,这20多年来的成就突出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从人文角度看,一个突出表现是我国人民的主体性不断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循。进行这么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亿万群众的充分理解、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和取得成功的。因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和决定力量。首先,人民群众对改革有强烈愿望和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倡导了改革开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保障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很快被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变成了一股巨大力量。其次,改革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实现的。改革的实践启示我们,人民群众凭借丰富的智慧和经验,通过实践,不仅为改革提出了许多好的方案、意见和办法,而且党制定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也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最后,人民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回顾20多年改革的艰辛历程,不难看出,那些群众发动得充分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改革的弄潮儿就大批涌现,改革就卓有成效,工作面貌一新,人民得利受益。反之,改革就举步维艰,缺乏生机,工作起色不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对人民主体思想进行了深刻阐述领会,准确地把握了人民主

体思想的精髓,更在于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而创造和发展了使人民主体性在改革中得以实现的条件。

(1)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群众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从而使其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得以充分发挥。

群众有没有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这是群众有没有进行自由创造的权力和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的关键。而群众享有进行自由创造的权利和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又是群众充分发挥其创造历史作用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过去我们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大限制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的发挥。在此种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群众在生产经营上就处于无权地位,群众的创造活动就会被视为违规行为。另一方面,该种经济体制也使群众的经济生活表现出过分的依赖性,群众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其创造活动也就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以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强调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8](14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向农民下放自主权,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空前高涨起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为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铲除政治障碍。

以往,由于我们长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致使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它为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发挥设置了重重障碍,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历史作用,就必须解决国家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为此,邓小平指出,首先,政治上要做到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其次,要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和约束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最后,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从而为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中国的改革是从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开始

的。这一开端昭示了改革与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预示了改革对人的解放的意义和前景。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企业和生产者获得自主权;从哲学上看,这就是人的解放,是人的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的主体性因私有制的消灭而获得了第一次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人的主体性因摆脱了传统体制而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三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同时是党的力量之源,是党的生命力所在。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的精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要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12]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特别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困难更多,我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利益观,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要制定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了解和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光辉真理相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法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人

民群众的主体性实现了飞跃。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在一个基本层次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戴望.管子校正[M].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28.

On Deng Xiaoping's "People-essence" View

LI Yu-hong

(Law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people-essence" view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ime-honored ideology of people-essence. It is demonstrated by serving the people with heart and soul, people's interest being insurmountable, the maximum democratic rights for the people, emphasis on people's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e history, and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our lines, principals and policies with people's interests as its basis. The "people-essence" view is of great directive fun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earlier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people-essence; ideology

[责任编辑:苏雪梅]